

新民晚报

父亲一百岁了，我们很早就盼望着等他生日这一天，好好为他庆贺一下，毕竟能活百岁的老人也是凤毛麟角。父亲本来身体很好，但自从年初摔了一跤，就每况愈下。我们一直祈望着他能眷顾他，让他安然度过百岁华诞。果然，天遂人愿，我们等来了父亲生日这一天。大家为他定制了蛋糕，并专买了生日的服装，把大家庭的全部人员都聚集起来。然当天中午他还好好的，下午突然发起高烧，于是他不能起床，不能与大家合影，也不能吃寿面和生日蛋糕。尽管遗憾，大家还是为他老人家唱了《生日歌》，吃了生日蛋糕与寿面，企盼他早日康复。

父亲生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也没有光照千秋的伟业，更没有家产万贯的遗赠，他是一个普通的人、一个忠厚的人、一个低调的人、一个没有任何奢求的人。父亲待人处世，是出名的宽厚善良，他的“真”和“善”是他一生的免检名片，但凡与他相交过

的人对他这一品行无不感佩。有几次，他在生意场上被人坑了，坑他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亲戚，而且数额不小，但事后他并没有结怨如仇，还是那样礼数周全，真诚待人，这种坦然这种释怀这种胸襟令常人叹服。

我记得在“文革”最糟糕的年代，他每天到单位都要向造反派交“认罪书”，而且不能重复，就因为他在他职业生涯里有短暂的做工商业主的经历。那那年仅十几岁的我总会代父亲将“认罪书”拟好，由父亲再亲自誊抄一遍交给造反派。那些日子我们总很担心，父亲会不会受到虐待和非礼，但每天父亲下班总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甚至还会路过“一定好”食品店时捎上刚出炉的糕点来解我们的馋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父亲之所以逃过一劫，实在是因为父亲一生几乎没有结冤结仇之人，他的人缘远近皆

知、有口皆碑。小时候父亲就给我们子女讲过“受气袋”的故事，讲一位先生因为拥有一个受气袋，因此无论遇到多大委屈和挫折，他都能忍下来。以至于我们和父亲开玩笑时，叫他“受气袋”，父亲这时候总是宽厚地笑笑，一点也不恼。

父亲养育了五个儿女，基本都培养成大学毕业，当时又没有义务教育，五个沉重的书包就是沉重的经济负担，父亲和母亲往往支撑不起这样的生活重负，因此妈妈常会变卖首饰，父亲更会省吃俭用。他们像蚕吞吐丝一般哺育我们子女，最使我感动的是困难时期，父亲单位里一次开荤打牙祭，父亲将分配给他的一个鸡蛋含在嘴里，出了厂门用手帕包好，回家给我吃。当时姐姐们都笑父亲不讲卫生，然事后我一直记得这份沉甸甸的父爱。

小时候我是骑在父亲脖子上长大的，因为那时每逢节日，人民广场会有大游行，外滩和南京路都会开彩灯，于是我总是骑在父亲脖子上去看大游行、去观彩灯。父亲当时还会经常带我去大世界，看哈哈镜，吃芝麻糊，最感兴趣的就是骑在父亲脖子上看大世界露天剧场的杂技。因此，父亲的肩膀是我孩提时的马沙拉蒂和劳斯莱斯。那时父亲最开心的时候，是听到哪一个孩子考进大学。记得有一年我的三姐姐考进大学，那时父亲在崇明支援围垦海

岛，接到家里来信，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，将他罐子里所有吃的东西全分给宿舍的同事。我们至今还保存着父亲那封喜形于色、溢于言表的来信。

父亲生平并没有大的叱咤风云的志向，但却有许多小的爱好。他出奇地喜欢丰子恺的画，“文革”中，这些美术界的权威受到批判，并以反面教材的名义来展示他们的画。我记得父亲就带我去观看过丰子恺的画，那时我还不谙世事，只记得有一幅画

很幽默，上面有题词：西边出了个绿太阳，我抱爸爸去买糖。当时给它的罪名是诬蔑我们心中的红太阳。以后我逐渐长大，我会给父亲收集各种丰子恺的画本，他都会珍藏起来。父亲还喜欢吹箫，他有三支长箫放在大衣柜里，哪一天他有兴致了，会泡上一壶茶，点起一炷香，然后悠悠地吹起箫来，箫声有点凄婉，有点忧伤。有一阶段家境困顿，吹箫对父亲来说也许作为排遣，而母亲却感到徒增了心中的烦恼，于是后来很少再听到父亲的夜晚箫声。我家订了第一大摞报刊，退休后父亲会在书桌前连续阅读三四个小时，几乎天天如此，令人纳闷的是将近九十高龄时，父亲竟然摘去了老花镜，新民晚报那么小的字，他都能裸眼阅读，我们窃喜父亲返老还童了。晚年，父亲喜欢上养鱼，他经常会偷偷溜出去，到花鸟市场去买他的热带鱼，以至于我们多次去附近的花鸟市场把他领回家。然而他执迷不悟，像个顽童，常常趁人不备时留张纸条，而人不知踪影，当家人为之着急，他却对自己的“捉迷藏”游戏乐不可支。

父亲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人生旅途，去天国追随母亲了。生前父亲的肩膀虽然瘦弱，然他曾拥着我长大。以后它像一道伟岸的屏障，横亘在我们与未知世界之间，为我们遮风挡雨。现在父亲走了，我们顿觉人生似乎只有去路而没有来路，因此作为子女我们永远留恋父亲的肩膀。

雁荡路小学

整理藏物时，我找出了五十多年前的雁荡路小学毕业证。如今，母校早已不复存在，连车水马龙的雁荡路也被改作步行街。唯有这张薄纸还承载着美好的记忆。

1956年，雁荡路小学由私立改为公办后，学校分成三部，一、二部在雁荡路上，三部则在南昌路48号，前身是有红色摇篮之称的大同幼稚园旧址，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及恽代英、彭湃等革命前辈子女在此生活过。

1964年，我从川沙转学到“雁小”，分在一部。换了学校，旧习未改。一次，见下雨，脱鞋、卷裤，赤脚进教室。同学用本地口音取笑我道：“今朝烘杜来那拉厘。”我对老师说，有同学采（骂）我。老师不解地说：“睬你，好哇，没人理睬，那才不好了。”说得我哭笑不得。

雁荡路全长仅300余米，学习气氛却很浓。与“雁小”二部比邻的是黄炎培、蔡元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，斜对面又是建庆中学。白天，行人稀少，充耳只闻读书声。一俟放学，求知大军如开闸放水，路上立时热闹了起来。

“雁小”由里弄住宅改建而成。大小不一的教室里，坐得挤挤挨挨的，卫生室设在局促的亭子间，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情不减，多次被评为市卫生先进单位。我喜欢在二楼教室小阳台观海景，北起淮海路口的永业大楼，南至复兴公园，尽收眼底。路旁店铺不多，除老虎灶、烟纸店及伙食店外，数洁而精川菜馆和中原理发店名气最响，我进“中原”理过几次，像我这样的“板寸”发型，全套0.45元，当时属高消费了。

螺壳里做道场，学校利用过道辟出了饮沙滤水区，还“挤”出前客堂作乒乓房。体育课只能占用元昌里场地了。弄堂里住着不少文艺界人士，有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小常宝扮演者齐淑芳，口技表演艺术家孙泰，作家陈村也搬来过，这是后话。弄堂里常能听到阵阵练唱、琴声，与体育课上的欢声笑语及老师的哨声交织在一起。

父亲的肩膀

陈圣来

父亲养育了五个儿女，基本都培养成大学毕业，当时又没有义务教育，五个沉重的书包就是沉重的经济负担，父亲和母亲往往支撑不起这样的生活重负，因此妈妈常会变卖首饰，父亲更会省吃俭用。他们像蚕吞吐丝一般哺育我们子女，最使我感动的是困难时期，父亲单位里一次开荤打牙祭，父亲将分配给他的一个鸡蛋含在嘴里，出了厂门用手帕包好，回家给我吃。当时姐姐们都笑父亲不讲卫生，然事后我一直记得这份沉甸甸的父爱。

小时候我是骑在父亲脖子上长大的，因为那时每逢节日，人民广场会有大游行，外滩和南京路都会开彩灯，于是我总是骑在父亲脖子上去看大游行、去观彩灯。父亲当时还会经常带我去大世界，看哈哈镜，吃芝麻糊，最感兴趣的就是骑在父亲脖子上看大世界露天剧场的杂技。因此，父亲的肩膀是我孩提时的马沙拉蒂和劳斯莱斯。那时父亲最开心的时候，是听到哪一个孩子考进大学。记得有一年我的三姐姐考进大学，那时父亲在崇明支援围垦海

岛，接到家里来信，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，将他罐子里所有吃的东西全分给宿舍的同事。我们至今还保存着父亲那封喜形于色、溢于言表的来信。

父亲生平并没有大的叱咤风云的志向，但却有许多小的爱好。他出奇地喜欢丰子恺的画，“文革”中，这些美术界的权威受到批判，并以反面教材的名义来展示他们的画。我记得父亲就带我去观看过丰子恺的画，那时我还不谙世事，只记得有一幅画

有年秋天，我们公司打假办三人去武汉出差，配合当地工商部门查处一起假冒我公司产品商标的案件。在当地工商人员大力帮助下，大量假冒产品被当场起获，商标侵权者受到了处罚。打假任务完成了，日期比我们预定的回程飞机票早了一天，于是下午三人从汉口来到了武昌，去慕名已久的黄鹤楼。

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代。唐代诗人崔颢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”流传至今，犹如著名商标，这两诗句如今成了黄鹤楼的无形资产。这天不是双休日，黄鹤楼四周游人不多。我们三人先站在黄鹤楼前一侧的宣传牌前看介绍，1700多年来黄鹤楼屡建屡毁，最后一次毁于清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大火，此后近百年未曾重修，现在的黄鹤楼于1981年10月破土重修，1985年6月落成。我们在楼前铸铜黄鹤雕塑旁留影，又在绿树成荫的公园里转了一圈后，进入黄鹤楼。

站在底层大厅，主任看着我时不知刘刘，说就这上去了？我和老刘一时和老主任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”？老刘调侃着催道：“领导说呀，什么意思？”主任说：“来点小刺激。我们搞次登楼比赛，看谁最晚下楼，晚上谁就给大家加道硬菜，同意吗？”哎哟喂，我和老刘笑起来，这不很简单嘛，况且能在黄鹤楼里比赛，也算别出心裁了，有点意思。其实

女猎鹰人

刘伟蓉

蒙古和英国等国合拍的纪录片《女猎鹰人》，诉说了个奇迹：在阿尔泰山山脚下，哈萨克族作为游牧民族，几百年来，靠男人用金鹰狩猎，获取食物和皮草，度过严酷的寒冬；而如今，只有13岁的女孩，打破传统和习俗，成为蒙古第一个女猎鹰人。

电影里的阿莎潘，满脸稚气，她和其他孩子一样，在学校上课、弹琴、下棋、打排球，功课全优，但她最想做的是和父亲、祖父一样，在深山里驯鹰捕获野兽。正如她的父亲纳盖夫所说：“在我们家，我们世代，都是驯鹰者，这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基因所致。”阿莎潘具有这种基因，此前，即使他们家族，这种特殊的技能，也从未出现过遗传的现象。

这理所当然引来反对声：“不，女孩不能成为驯鹰者”“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”“女人上山追逐动物很难”“男人驯鹰时，女人留在家准备茶水”。电影让一个又一个老人出镜，展现他们的不屑。但阿莎潘的家人却是支持者，尤其是她父亲。母亲说：“阿莎潘从小就被鹰深深吸引，目不转睛盯着爸爸喂它们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她热爱生活。”祖父获知她要参加驯鹰大赛，赐福给她：“没有鹰能从我手心逃走，没有马会在路上把你抛弃。”父亲说：“男孩女孩是平等的。”他看出女儿是天生的驯鹰者，他要吧全部技能传授给女儿：如何为鹰戴眼罩，如何呼唤鹰追逐猎物，如何优雅地举起手臂，让鹰从远处飞到手上……

这是一部迷人的电影，高山、草地、雪原，在蒙古拍摄的美丽风景，带着一股威严。阿莎潘遇到的第一个挑战，就是寻找雏鹰——一只完全属于她的鹰，由她自己亲手驯养。在险峻的山上，发现鹰巢。在父亲帮助下，她捆绑绳索，爬下山崖，脚下松动的石头不算，更惊险的是，外出觅食的鹰妈妈马上就要归巢，而小鹰又逃离了一段距离，好在她用绳索和毛毯，艰难而又危险地捕捉到一只三个月大的雌鹰。

驯鹰大赛的地点，要走一整天，画面轮转出草地、荒原和河流。驯鹰大赛的气氛，电影烘托得十分浓烈。除了阿莎潘，其他70名参赛者都是男人，其中有58年经验的高龄驯鹰者，有著名驯鹰人的儿子。主持人骄傲地宣称，几百年来，我们男人靠驯鹰，找到了凸显自己的方式，获得快乐：“看着雄鹰翱翔在蓝天之中，狐狸穿梭在原野之上，骏马飞驰，是多么大的视觉享受。”阿莎潘之前的参赛者很多都取得不俗的成绩，轮到她，无论是马匹、服装和装备，还是鹰追逐猎物的速度，都很出色，尤其是呼叫远处的鹰飞落手上，只用了五秒钟不到的时间，打破了历史记录。一个女孩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冠军。

本片导演奥托·贝尔，用航拍、慢镜、蒙太奇、配乐，把电影装扮得赏心悦目、激动人心。最后一场戏——去深山狩猎，是体现阿莎潘真正冠军价值之所在。俯瞰镜头里，起伏的群山、茫茫的雪原，是原始自然力的象征；几经失败，当阿莎潘的鹰最后终于捕捉到狐狸，慢镜头呈现的不仅是鹰对狐狸的征服，还是人对传统观念挑战的胜利——阿莎潘展示了不受性别限制的强大力量。

前年，我们公司工会组织过员工登高比赛的，十几层的办公大楼不亚于黄鹤楼高度，我们办公室人员都参加了，有经验。只是在主任和老刘岁数又上去了，进入五旬年龄，我占着年轻优势，显然不公平，就起了心思如何让着他俩，又不让人难堪。主任又说：“这几天我们在这里打假维护公司利益，都很辛苦。我这种自说自话的

成都绝句

何佩刚

青羊宫岁月
李耳牵羊过此方，
玄元皇帝美名扬。
繁华道观千年旺，
单角青羊是宝藏。

薛涛诗魂
浣花溪畔平凡女，
一代诗坛别有名。
自制红笺传素稿，
至今古井尚留魂。

高铁进山啦（中国画）蔡超

边涛 李鸿莉



黄鹤楼“加菜”记

龚伟明

建议也不要当真，明天就是重阳节，大家就当白相一下吧。”
几天来，我们三人在武汉市区郊县间来回奔波查获假冒我们公司商标的产品，确实冒着被侵权者报复的风险。主人的一番话，让我和老刘暖心。于是，三人击掌，走上楼梯，当然不是跑，只是加快脚步而已。
三人中，主任喜欢摄影，老刘爱书画，就我无啥喜好。他俩的作品，都在局工会组织的多次征稿活动中获过奖。三人上楼，距离也就一步之遥，很难分出前后。这不，到了三层，三人不约而同地停步，观摩起陈列着的有关诗词书画，似乎都忘记有比赛之事。黄

高铁进山啦（中国画）蔡超

边涛 李鸿莉

鹤楼每层风格不相同，除底层大厅，二、三层有回廊，有游客来回观望。到了第四层，老刘看见有人在大桌上铺着宣纸泼墨作画，不由自主地伫立，我瞥见主任已经走远，不好意思再走，陪着老刘。老刘也不吭声，十分入迷地看人家一笔笔“按、压、勾、顶、抵”变化着作法。我环顾四层也有回廊，便过去看风景。约莫半小时后，大概老刘看过瘾了，走过来叫住我：“上去吧。”
黄鹤楼共五层。我俩看到主任拿着单反相机，在回廊里或站立，或蹲着，正聚精会神对着四周景物照相。这里高达50余米，长江景色、对岸市景让游客一览无余。长江大桥上车辆来往，川流不息。楼下，不时有轰隆隆的火车声传来。
将要下楼时，我觉得自己的心思白费了，说：“老刘画画看好了，主任你照也拍完了，说好的登楼比赛呢？”三人一齐乐呵呵起来。主任说：“计划不如变化。登楼时，老刘肯定没想到会有绘画表演，我也没料到顶层视野开阔，适合拍照。现在我决定取消上楼时的建议，晚上我为大家加菜。”
婆婆追求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学习高度，是一种另类的“登高”。

十日谈

登高 责编：龚建星